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

五四文学： 启蒙的维度与向度

潘正文 著

——
以文学社团为中心的考察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启蒙



潘正文

2005年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朱寿桐教授；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出站，师从杨义研究员(学部委员)。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任浙江省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已出版专著《五四社会思潮与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两浙人文传统与百年浙江文学》等。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省部级课题四项。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几十篇。获浙江省政府、浙江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多项。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

五四文学：启蒙的维度与向度

——以文学社团为中心的考察

潘正文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 杭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文学：启蒙的维度与向度：以文学社团为中心的
考察 / 潘正文著. —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20.1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 / 高玉主编)

ISBN 978-7-5178-3499-1

I. ①五… II. ①潘… III. ①新文学(五四) - 文学研
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2184号

五四文学：启蒙的维度与向度——以文学社团为中心的考察

WUSI WENXUE: QIMENG DE WEIDU YU XIANGDU — YI WENXUE SHETUAN WEIZHONGXIN DE KAOCHA

潘正文 著

策划编辑 郑建

责任编辑 唐红 谭娟娟

封面设计 王辉 张俊妙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电话：0571-88904980, 88831806 (传真)

排 版 庆春籍研室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73千

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3499-1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总序

当今文学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学史来完成的，本科教育是这样，研究生教育也是如此。在学科分类和学术研究中，文学史都是文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没有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史涵盖或牵涉所有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所以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教材编写，文学史都将是说不完的话题，文学史作为教材“常编常新”，作为学术“常研究常新”。

大约从2008年起，我和同事们有意编一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并且希望有所突破和创新。这种突破和创新不仅体现在教材内容上，也体现在体例上。我们也希望这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有所推进，避免各种陈陈相因。我发现，很多教材之所以陈陈相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编纂者缺乏对他书写内容的深入研究，因而多是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我们最大的努力就是把教材编写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以此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于是就有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这个项目，并于2015年申请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获得通过（编号2014GH006）。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或“新文学”）“时间段”划分及其模式的问题。虽然说中国新文学发展至今只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就时间而论其无法与古代几千年的文学史相提并论，但这百余年与古代的任何一百年都不一样，就其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内容的丰富性（如涉及的材料、文学现象、文化背景交融等）、矛盾的多重性（古/今、中/外、城/乡、传统/

现代等)、作家作品数量上的巨大性(21世纪以来,仅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数千部之多)等特征而论,它是全新的类型和品质,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古代断代文学史式的简单叙述不同,需要一种新的研究方式。

同时,百年来的新文学本具有一体性,把它简单地划分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是适合的,在今天则完全不合适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内容上的严重不平衡。现当代文学史在发展上是“自由落体运动”式的,也即文学现象特别是作品在量上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增加的,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密度”很大,内容非常丰富且复杂,但在文学史的版图里却被“压缩”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现代文学仅30年,而当代文学已有70年,且时间上还在向前延伸,这不仅在时间上不平衡,在内容上更不平衡。当代文学内部,由于内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再加上巨大的差异性,笼统地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不可能,笼统地研究当代文学也不可能,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需要分工协作,需要分“时间段”来研究。

事实上,自晚清以来,新文学经历了多次转型,其中既有晚清以降传统向现代的新旧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的当代转折,以及70年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裂变等这样具有“知识型”层面的大的转折,也有像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发生发展、20—30年代的新文学繁荣、40年代初至1949年的文学发展的区域性分割、“文革”前后文学演变反转、80年代文学的盛世想象、90年代文学的“大转型”等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的时段。如此种种,使得以发展阶段为基础,对其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史”的研究,成为必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既需要宏观的演变研究,也需要更为细致甚至琐碎的“横断面”的“解剖性”研究。

狭义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初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有它的合理性,它意味着一种不同于过去三千年文学的新文学的开始,但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具有独立性,现代文学在实绩上的确具有巨大成就,伟大作家群星闪耀,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宏观时期越来越

五四文学

启蒙的维度与向度

越不合适，它甚至没有纯粹属于自己时代的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多跨两个时代，或者从晚清到民国，或者从现代到当代，没有跨越时间之外的叙述，这些作家都不可能是完整的。正是从“完整”的角度，本丛书专著“清末民初”文学一册。我相信，将百余年文学发展的自然时段作为分段的依据，这既是一种分期法和对约定俗成的文学现象的认知，也是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的体现。这一体例既能有效避免在现代和当代之间人为强制地划定界限，避免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各自复杂性的化约，也能更为详细地梳理百年文学的纹理脉络，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百年文学的历史走向。

高玉

2019年10月23日于浙江师范大学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新青年》群体与五四启蒙文学	009
第一节 《新青年》与五四启蒙文学的时空源流.....	011
第二节 启蒙与“西化”：五四白话文学语言革命.....	023
第三节 五四启蒙思想转型与人道主义文学大潮的兴起.....	041
第四节 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鲁迅的启蒙小说.....	053
第二章 “人类”“互助”： 文学研究会的启蒙之道及其文学表现	077
第一节 人类主义意识文学研究会的世界文学视野.....	081
第二节 人类主义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新理想主义色彩.....	099
第三节 互助主义与文学研究会的“泰戈尔热”.....	112
第四节 文学研究会“爱”与“美”创作中的助主义色彩.....	125
第三章 创造社：从“感性”启蒙走向革命	139
第一节 从“感性”先锋到革命先锋：造社的启蒙路径.....	143
第二节 “感性”的宇宙：郭沫若的诗歌创作.....	156
第三节 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的“情绪”派小说.....	166

第四章 “立人”与“人生的艺术”：语丝派的两种启蒙路径 .. 179

- 第一节 鲁迅与周作人启蒙路径的分野..... 183
- 第二节 “立人”以“立国”：“鲁迅风”的启蒙路径..... 197
- 第三节 “人生的艺术”：“启明风”的启蒙思路..... 210

第五章 自由与理性：新月派的文学启蒙风尚..... 223

- 第一节 自由与理性：新月诗派的启蒙追求..... 226
- 第二节 健康、尊严、和谐：新月派的小说风貌..... 240

参考文献..... 269**后 记..... 276**

五四文学阶段，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它不仅以轰轰烈烈的白话新文学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全新发展的广阔天地，还基本奠定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乃至格局，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因此历来受到学术研究界垂青，其受关注程度远远高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其他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五四文学研究已经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一门显学，有关五四文学研究的论文论著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而且这种趋势还将在 21 世纪乃至更为久远的未来持续下去。

五四文学研究，从来就不是“纯粹艺术问题”的研究，而是包容了“文史哲”三方的综合性研究，因为五四文学是中国的文化、伦理、思想、审美全面转型的结晶。我们如果用“关键词”的方式来描述五四文学研究，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特点，迄今为止，它经历了以“革命”“启蒙”“现代性”为整体性命名的三大研究阶段。在李何林、胡云翼、唐弢、王瑶等第一代现代文学史家的著述中，政治色彩较强的“革命”一词，是他们描绘五四文学的突出词眼，当然，其间也涉及“启蒙”问题，但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政治化诉求，在第一代文学史家那里，后者的地位显然远远没有前者突出，时至 1957 年，尽管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发出了以五四文学的“人的启蒙”为标杆的呼声，但很快就为时代的政治因素所压制而消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新时期前后。到了杨义、钱理群、王富仁、吴福辉、温儒敏、刘纳、赵园、汪晖、陈思和、王晓明这一批新

五四文学

启蒙的维度与向度

时期崛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的著述中，“启蒙”一词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革命”一词，成为了这一代文学史家描绘五四文学的关键词，个性、自由、立人、人道成了他们论述五四文学的重要维度，即使在他们的论述中出现“革命”一词，政治化的指向也已经大大淡化，而成了文化转型的代名词。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一词之于五四文学研究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俞兆平、宋剑华等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真伪问题的论述引起了较大的讨论，而到了一批更为年轻的学人那里，“现代性”一词则获得了更大的垂青，杨联芬、郑家健、张宝明、张光芒、王桂妹等一批青年学人都倾向于用“现代性”来对五四文学做整体性的描述，而把“启蒙”作为描述“现代性”的辅词。这种转变，恐怕包含的不仅仅是年轻一代学人在学术研究上的创新需要，还包含着他们对五四文学的客观史实的一种新认识。

迄今为止，尽管有关五四文学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因为研究越深入，发现的问题也就越多。本著之所以想在五四文学研究的已有大厦中不揣浅陋地加砖添瓦，是想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

迄今为止，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和后来的研究者都喜欢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来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人的解放”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但是，具体到新文学上，这种比附显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革命的特殊性重视不够。稍加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以文艺复兴为背景的西方文学，个人的享受、个人欲望的满足受到了较大的尊重，如《十日谈》；但五四新文学，则反对个人享乐主义，也反对个人欲望的单纯满足，婚姻恋爱的自由只有和“反封建”、社会改造的宏大意义联系在一起时才受到肯定，而鸳鸯蝴蝶派的不少写婚姻恋爱自由的半新半旧的小说，却因为对“封建”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妥协，而广受新文学界的批评，被视为娱乐主义、个人享乐主义。再如，具有启蒙运动背景的西方文学，人道主义往往成了最高准则，人道的价值被看得比国家和民族更为重要，如雨果的《九三年》。朗特纳克虽然是保皇党，但他并不是一个丑角，他在战场上受挫逃亡之时，由于受到人道主义的内心召唤，从大火中救出了革命党

人无辜的孩子耽误了逃跑时间而被捕，革命党领袖郭文给予了他这种人道情怀相当的尊敬，放跑了他，而宁愿自己受绞刑。在小说中，伟大的不仅是革命者郭文，反面人物朗特纳克也同样因为忠于他自己的人道理想而得到了应有的尊敬。而在五四新文学当中，人道主义虽然受到了重视，鲁迅对于封建文化“吃人”的批判，文学研究会的大量的“爱”和“美”的作品，都有较强的人道主义色彩，但人道一旦和革命、民族救亡相比，则显然又是后者成为最高准则。鲁迅虽然讲人道，但也主张“不宽容”，而事实上，“宽容”是人道主义最为基本的教义；在文学研究会的“爱”与“美”的文学中，《九三年》这种把人道主义视为高于革命和国家利益的情形，也很难出现。

以上的种种不同，都显示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革命，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两者的发生背景和动力并不相同。第一，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文艺复兴是从欧洲商业较为发达但又较为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发起的，它是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由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工业文明过渡的自然结果。经济地位的提高，物质的丰富，必然要求个人的欲望得到更多的满足和肯定，也要求少一些中世纪的经院、教会的清规戒律的约束，同时市民也要求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文化上也要求与新经济相适应的宽松氛围，因而导致文化革新。而且这些需求，只比较可能在远离政治和统治中心的区域内形成风潮——只有这样才不会一抬头就遭受打压。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起于上海的《青年杂志》，但实际上成为风潮，却是到了政治中心的北京之后。同时，中国此时虽然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北京不是商业中心，五四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的要求，更多的也不是出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人性需求，而是出于改革国内的政治、文化、伦理的要求，来最终实现民族救亡的目的。

第二，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革命的“反传统”，学界也一直存在着颇大的争议。一派观点认为，五四全盘颠覆传统，是一种激进主义，具有代表性的有余英时；而另一派观点则认为，五四其实并没有全盘反传统，它反的只是传统中的不合理的一面，具有代表性的有严家炎。而更多的学者，则在承认五四全面反传统的同时，认为这只是当时“革命”的一种策略——像胡适等人所说的“矫枉必须过正”，因为中国人保守成性，你要改革五十步，就必须定好一百步的

五四文学

启蒙的维度与向度

目标，保守的中国人一拖后腿，则正好达到五十步。但从新文学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问题其实比现有的讨论更为复杂。新文学提出的废除古文（乃至废除汉字），打倒儒教的忠、孝、节、义伦理，全面倡导文学语言的“欧化”，提倡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等等，确实是在全盘反传统。但结果是，中国新文学仍然是“中国”的文学，有很强的中国化色彩，而没有成为“西方”文学。当然，这并不是证明了“矫枉过正”而恰好得其“中”的理论，而是说，“传统”在内容上，你可能很轻易就提出许多需要反它的理由，而且反得再激烈，新文学派本身也不会认为有何不妥；但是，“传统”在内容之外，也还存在着思维结构、“认识论”等“形式”问题，那可不是轻易几句话就能反掉的，因为这是不易觉察的因素。

五四的新文学派知识分子虽然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很大，但是，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的思维结构——从道德角度去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道德优先的“认识论”，却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改变。我们不妨试举一例，鲁迅、叶圣陶都是师法俄国“为人生”的人道主义文学的宗师，但是，他们的作品却与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有很大的不同。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小偷、杀人犯、疯子这些“抹布”一般的人物，都有一个向善的灵魂，在经历灵魂的迷失而犯罪之后，他们都会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判，并最终觉醒和忏悔。而鲁迅笔下的阿Q这一“抹布”式的人物，完全缺乏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同类人物的向善光芒。阿Q干完坏事，从来不会受到自身良心的谴责，他不知忏悔为何物。在列夫·托尔斯泰笔下，比民族利益更重更大的还有人类的利益，聂赫留朵夫对于玛丝洛娃的忏悔，并不完全是为了他自身的身份和面子，更多的是来自他作为人类一员的良心发现，而托氏对于这种作恶者的忏悔和向善，无疑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潘先生在难中》），除了满身的市侩味和可怜的“灰色”之外，我们也丝毫看不到他会有悔改的可能。那么，中国下层民众中“抹布”式的人物和“灰色”知识分子这些国民，是否与俄国的同类人物相比真的就缺乏灵魂呢？在笔者看来，文学作为一种想象的产物，这种不同，与其说是现实的差异，毋宁说是来自作家的不同想象。其背后的原因，既与前面提到的五四知识分子的救国情怀有关——对“抹布”和“灰色”的强烈批判，其背后无疑具有较强的希

望国民振作志气，成为“救国之一助”的色彩，又有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思维方式上的区别。欧美和俄国属欧洲的近现代作家，都受到过基督教文化基因的熏陶，基督教的既有教义，对于人性固有的弱点持有某种程度的同情和宽容，如《圣经·新约》中耶稣看到众人用石头砸那位出轨的妇人时，向众人说，如果你们当中谁觉得自己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去砸那妇人，结果众人都停了手。基督教文化基因中的这种宽恕博大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国家、美、俄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而人道主义又是现代性文化与文学的重要一极。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以“内圣外王”为重要追求，在基督教的“认识论”看来，不可能达到的“圣”（道德上的上帝标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追求，它主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形式。因此，人道主义思想到了中国知识分子这里，很容易就变成一种道德至善主义。因此，阿Q、潘先生在中国作家笔下，是很难有忏悔和改正的可能的，因为在道德至善主义的认识论中，“恶”是不可能得到宽容的！

第三，现有的研究和文学史论著普遍认为，五四新文学革命，白话取代古文的合法性逻辑基础，是“进化论”。确实，胡适关于白话文学主张的表述，是和“进化”一词紧紧相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们是否也应该意识到，严复是“进化论”的引进者，但他以“进化论”来反对白话取代古文的合法性地位。胡适认为，古文慢慢转变为白话，是语言的“进化”；而严复认为，白话经过了古人的锤炼成为古文，这才是进化——进化是由简入繁，而不是胡适所认为的那样由繁入简。如果我们今天以客观的眼光看，似乎应该是严复的逻辑更符合生物界的进化实际——单细胞进化为多细胞、简单动物进化为复杂动物。那么，我们应该做何解释？

第四，现有的研究和文学史论著普遍认为，文学研究会秉承的是来自俄国并经鲁迅在《新青年》上所奠定的重枷锁；而文学研究会核心作家群笔下的许多儿童、女性、下层民众却带有不少理想色彩，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是“爱”与“美”的人性体现者。在冰心的《超人》中，禄儿的爱轻易就感化了信仰尼采超人哲学、以爱弱者为耻的冷冰冰的何彬；在王统照的《微笑》中，女犯人的一个善意微笑，居然使小偷阿根幡然悔悟，出狱后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工人。同是“为人生 / 人道主义 / 现实主义”，为何鲁迅与文学研究会的创作会有如此大的

差异？

第五，现有研究和文学史论著普遍这样来论述创造社的作品特色——个性主义 / 浪漫主义，鲁迅也大力提倡个性主义，那他为什么就没有走向浪漫主义？而且，鲁迅当年在《摩罗诗力说》中赞美的摩罗诗人，许多都是浪漫主义作家。鲁迅为什么就没有从个性主义走向浪漫主义，而创造社却从个性主义走向了浪漫主义？“个性”一词，在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那里，内涵是完全相同的吗？

以上种种诸如此类的问题，笔者以为，恐怕都得从“思想”的角度去解决。撇开“思想”而单从“艺术性”“文学性”“文体”的角度去讨论，五四文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恐怕都将无从解决。

众所周知，由于“反封建”的需要，五四文学总体上是以集团军的形式来对中国的旧文学传统进行作战的，新文学群体成员以结社的方式，形成了多个战线，“新青年 / 新潮”文学群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共同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的主体，但正如鲁迅曾经指出的那样，新文学群体虽然在反对旧文学上意见大体一致，但在提倡怎样的新文学上，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直接体现在“新青年 / 新潮”文学群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各自的文学主张上，但是，这些文学倾向大体上仍然主要围绕着“启蒙”的问题，只是在各个文学团体之间，形成了各自不同或各有侧重的启蒙路向问题。本著主要探讨的便是以上五大文学群体中，各自提出的新文学的启蒙路径和维度，故名曰，五四文学：启蒙的维度与向度——以文学社团为中心的考察。

